

文匯講堂 上海6000年 第169-7期

# 上海特色金融业态钱庄为何重要

宋佩玉、吴景平研讨钱庄对近代上海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作用

现场互动

## 钱庄与建设国际贸易中心有何关系？



宋佩玉与吴景平就钱庄对近代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展开讨论

整理 李念 夏知雨  
版式 李浩  
摄影 周文强

### 钱庄对银两、银圆的定价权源自中国传统历史

设计师吴羽东：近代的货币定价权掌握在本土钱庄手上，它是如何获取的？  
吴景平：钱庄对银钱之间、银两和银圆之间的定价权的获得，是与生俱来的。它一开始就只做钱的兑换，包括不同种类的银钱，面额不等或与不同地区的银两的兑换。特别是银两的使用，银的成分、成色是由市场公估局负责，公估局和钱庄始终是共生关系。  
银圆进入中国，它按中国标准到底折合多少银两？最权威的机构就是钱庄，一方面中国人相信且接受，另一方面洋商同样必须接受。这是传统历史习惯的结果。货币制度根本变革转型之后，如废两改元，特别是1935年实行法币制度之后，钱庄本身并不从事外汇业务的买卖，更无从介入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以及汇丰、麦加利两家外商银行共同确定的外汇定价。这就是另一个时代了。

### 国内外因素促1935年法币颁行，弱化钱庄地位

中学教师张智梅：1930年代因银行法出台，突然银行、钱庄、外国银行的比例有了大变化。请问是何背景？  
吴景平：1931年颁布的《银行法》，是南京国民政府加强银行业监管的重要法规，同时《银行法》将对钱庄的管理纳入其内，并表示不另行颁布钱庄法规，体现了华资银行业在财政性金融业务中已居主导地位，钱庄的作用日益式微。虽然《银行法》没有立即施行，却成为钱庄、华资银行和外国银行三大势力消长进程的重要界标。  
1934年美国白银政策导致白银风潮，对实行银本位币制的中国造成极大冲击，如果不改变中国的货币兑换制度，把货币同银的关系切断，那么银价的涨落就会使中国货币的稳定度无法自控。这将导致商业成本乃至债务人的债务大大超出原来借贷协议的风险。于是，1935年11月中国政府推行法币政策，只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发行法币，后加入中国农民银行。  
当时钱庄业遇到的风险尤其巨大，市场上的白银外流失控，大量信用放款难以收回，许多钱庄为了继续营业只能向政府或者大银行求贷。为应对危机，在救济金融业方面中央银行严格控制放款条件，所有贷款必须经过中央银行或其委托的放款行审核同意。钱庄凡是在危机时期申请贷款，必须有切实的抵押物，如地契、有价证券、房产。钱庄的主要业务受政府委托由大银行监管。法币政策推行后，钱庄传统优势地位进一步被压缩。

### 各类金融衍生品的原理归根结底都是信用关系

国企职工吴乃衍：开埠以后上海发布了一些衍生品，对上海当时的金融起到怎样的作用？  
吴景平：衍生品无论对中国市场、中国的金融机构，比如钱庄、票号、银行来说，都是新生事物。但无论是票据贴现、金融期货，它们的道理归根结底就是信用关系。这些对中国的钱业来说是学习和接受的过程，也参与有关的博弈。对中国来说是新生事物，但在海外、国际范围内可能已有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和更大市场空间。  
今天我们可以非常坦然看待金融衍生品，因为它们也是国际金融市场中的主流玩家了。

### 嘉宾对话

宋佩玉：吴老师所述不限于钱庄、外资银行、华资银行，也不限于汇票、支票，而是把整个上海近代的金融业完整地呈现出来了。从中我们可看到在1920到1930年代，上海就已经具有了国际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的气派。  
这里我们有必要溯源一下近30年来上海的城市定位变化和发展。1990年代初期，上海提出要建“三个中心”，即国际经济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1990年代末提出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因为当时中国想要加入世贸组织，并在上海建了洋山港；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到上海考察，对上海作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指示，因此，现在上海的城市定位是深化“五个中心”建设，之所以能够进行五个中心的建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上海这个城市所具有的历史底蕴。

态，洋行承担金融业务，同钱庄只在点和面上进行接触，并未改变两者相异之本质；等到外资银行进来之后，二者迅速结合，外资银行把自己多余的款项拆借给钱庄，钱庄将拆款投入到与内地的贸易中。  
钱庄作为东西方两种商业系统的中介或者说桥梁，主要是利用庄票、拆款两种金融工具。为了更好地理解，庄票类似于今天的银行本票，钱庄就其性质而言，实际上已经具有了商业银行的灵魂。至于拆款，外资银行、票号、华资银行，先后都对钱庄放款，其实就是贷款。  
这两种金融工具使上海对外贸易活跃起来。我们通过有限的数据来看，以庄票论，19世纪70年代，它在票据市场上占的份额达到70—80%，这是非常大的占比；到20世纪，1926年，庄票仍在票据市场上占据了80%，而银行的支票只占10%，其他票据占10%。到了1931年，是钱庄发展的转折点，它有个规律化的过程。

吴景平：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银行法》，规定经营银行相关业务的，不管名称叫什么，都视同银行，必须一律遵照该法规。所以钱庄必须要对此作出新的回应。  
宋佩玉：1931年是钱庄的转折点，这一年庄票在票据市场上只占到50%，银行支票上升到40%，其他类票据占10%；1936年变化更大，庄票只占20%，支票占到70%，其他票据占10%。

除开谢立三描绘的四川、镇江、宁波更是如此。镇江是洋货从上海进口往北扩散的重要据点，上海钱庄放于镇江钱庄的款项很多，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一些大钱庄本身就是镇江出身；而宁波，在1920—1930年代，每年进出口贸易达到三千万，主要是靠上海钱庄提供资金支持。从这些数据可以得出，上海钱庄的发展、信用和放贷的扩张，同上海进出口贸易是同频共振的。  
用指数说话，如果把1865年设作基数100，1936年指数就是3400，由此可知上海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这是上海成为近代国际贸易中心的重要特征之一。这种贸易量的扩张，虽然很难言上海钱庄究竟若何贡献，但可以肯定的，在缺乏资本累积与完善融资机构的传统中国，如此数额的进出口贸易，势必仰赖钱庄的信用放款支持。

钱庄对上海近代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  
宋佩玉：近代上海金融业，华资银行、外资银行、钱庄三足鼎立。他们势力如何变迁呢？  
1925年后外资银行由盛而降，钱庄发挥毛细血管作用  
先看数量变化。1897年之前，在上海只有钱庄和外资银行，外资银行的资力强于钱庄；1925年是外资银行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五卅运动爆发，激起了上海民众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打出了非常鲜明的口号“拒用外资银行钞票”，挤兑外资银行。有数据显示，五卅运动时期外资银行市场份额占37%，华资银行41%，钱庄22%。此时，钱庄已经开始实力下降，外资银行也在慢慢收缩阵线，华资银行则异军突起。1936年，大致有33家外资银行同时存在，而华资银行有145家，还有若干家钱庄。从资力的分布来看，华资银行占73%，外资银行占19%，钱庄只占8%。到1946年，华资银行市场份额已经达到80.5%，其中主要是国有银行，外资银行下降到12%，钱庄下降到6%。

在整个金融市场的发展过程中，不能简单地说钱庄是以“前近代”的方式运作的。首先，在金融市场中，各类金融机构竞争，外资银行和钱庄大银行可以说是金融的主动脉，在外资银行不能广设分行，华资银行尚未设立的情况下，钱庄则起到了毛细血管的作用。在钱庄的分行广泛铺设之时，就是钱庄在面向普罗大众、斗小民，使得整个金融市场充满活力。  
上海金融能力，不仅表现为数量的优势，而且表现为品种齐全的优势。外资银行主要经营国际汇兑，华资银行和钱庄则在国内汇兑方面具有优势。而从金融工具上来说，和钱庄相关的就有庄票的发行和拆款的运用。

钱庄参与申汇市场制定标准，规范化中达成均衡  
第二是钱庄对吞吐全国资金市场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上海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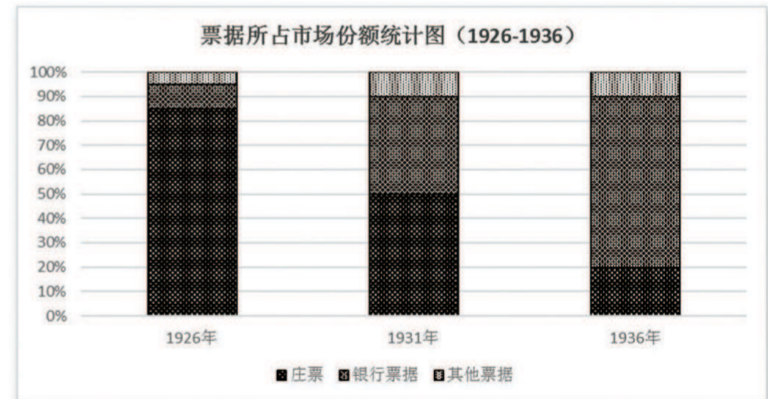
### 钱庄对上海近代国际贸易中心的作用

宋佩玉：我是做外资银行研究的。不仅外资银行在上海近代国际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而且钱庄也在两个中心建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往的研究往往忽视这一点。首先来看钱庄与近代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关系。  
刚才提到外资银行为钱庄拆款，实际上票号也承担这项业务。票号是活跃在北方的重要金融业态——它只办单一的汇款业务，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又承担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汇兑业务。它的闲置资金是投放到官僚、地方政府和钱庄上的。  
19世纪末期票号大致有32家，全国分支机构达到175家。如果将钱庄和票号进行对比，最不同的一点就是钱庄更多面向实体经济的工商业进行投资，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现代化和国际化的特点。

利用拆款和庄票两种金融工具，钱庄促进对外贸易  
宋佩玉：除票号为钱庄拆款外，综合来看，钱庄对上海近代建设国际贸易中心发挥了如下作用。  
其一，钱庄在内地帮助土商将支票向相关银行进行结算收取现款。但钱庄因为资本有限，要想参与国际贸易，必须求助于外资银行和票号，而后的华资银行成立，很快取代了外资银行，开始为钱庄进行拆款。当时的进出口贸易以及货物在上海和内地间的交换能非常顺利地发展起来，中介人钱庄功不可没。此外，在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之前，整个中西贸易之间是处在并立状

### 钱庄信用和放贷，与上海近代进出口贸易同频共振

宋佩玉：拆票是东西方对视后，传统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庄票存在外资银行，外资银行拆款给钱庄，两天外一次利息。此时，外资银行很想做这笔生意，以汇丰银行为例，其存款在1865年成立时为200万元，到1869年达到600万元，这些存款的利息非常少，约在3%左右。但当这笔钱被拆给钱庄的时候，利息则定在15%。当时中国民间大多处在高利贷的状况下，借贷利率通常在30%左右，因此，虽然15%的利率对钱庄来说已经是一个很高的数值，但就其拆给贸易商的利率而言，依然是有利可图。当然利率有个不断下降的过程。  
由此可见，外资银行和钱庄水乳交融的关系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利益。拆款额的数据也很难获取，大致来说，1870年代，外资银行和票号加起来对钱庄的拆款大概200万两到300万两，基本可以应付当时上海对外贸易。到1880年代，达到570万两，19世纪末上升到700万两到800万两，1911年曾达到1400万两，1924年江浙战争时大致1200万两。有数据做支撑，可大致知道上海的对外贸易是怎么在钱庄和外资银行业务之间，在支票和庄票清算或者运作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1870年驻重庆英国领事谢立三提到，上海钱庄给四川商人的贷款使得他们可以把洋货到四川各地，甚至进入到贵州或者云南僻远之乡，土货又以同样的方式运至上海。



▲1926年到1936年间票据所占市场份额统计图



▲中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由山西商人创立于道光三年，现为中国票号博物馆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是上海第一家由华商开设的交易所，图为1920年7月该交易所的开业仪式现场